导　言

铁甲征衣是古往今来军戎衣冠服饰的通称，也就是军服。铁甲主要是指古代的首铠、面铠、铠甲及马铠，是军人及军马的防护装备；征衣主要是指古代帝王、文武百官和兵士们穿着的服装、首服、足服及其服饰。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铁甲征衣与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军服上的点点滴滴，都是文化大潮的激荡和折射。在漫长的服装文化发展中，铁甲征衣是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军服是精心珍藏鲜为人知和亟待开垦的民族瑰宝和文化园地。所谓军服文化，就是军服所透视出来的等级、制度、宗教、信仰、传统、习俗、观念、美学、艺术等等。

衣冠服饰，作为一种物质产品，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它自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防身、御寒等。此外，它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和时代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性。从人类自觉地用衣物包裹自己躯体的那一刻起，服装服饰的创造就具有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层意义。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人生历程中，从初入襁褓到受冠笄之礼，从婚装嫁衣到丧服祭冕，从军服到各个职业的专用服装，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的服装和服饰上表现出特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文化和魅力。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民族追求美的心理历史几乎都是相似的。然而，各个民族对美的创造并不是随意的，它总是要受本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经济生活乃至所居住环境的制约。有的藉服装记史述古，进行礼仪教化；有的藉服装抒情明志，表达该民族的理想与追求。当代台湾服装设计师罗红芝就曾说过：“服装，除了传递美，还传递丰富的文化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驻守埃及的英国军官，上穿小翻领军服，下穿马裤，足蹬高腰马靴，头戴圆形帽，右手持拐杖，左手拿烟斗， 十分潇洒，表现出一派军人型的英国绅士风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纳粹军服，冠冕堂皇，却透着法西斯文化的残暴和狰狞；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左右着军戎服饰，受林彪、“四人帮”的干预，语录本成为一种特殊的佩饰，甚至走上检阅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员都手持毛主席语录，以表达自己的忠心；绿军装风行神州大地，成为时尚流行色和时髦款式。

军队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从文化的角度看，军服具有社会性目的和生物性目的。如军服的社会性目的可以这样认为，具体体现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和帝王君主个人的好恶，并受当时文化、艺术及审美倾向的熏陶，用于装饰、礼仪、威严和区分等级，具有美观、识别和象征意义；其生物性目的可以理解为，保护身体、调节体温、提供舒适。军服的根本功能是防护，要能适应战争的特殊环境，具备防寒御冷、调温、调湿、调气等功能，以着眼于使军人能在各种条件和环境中自如地行动，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保证身体的健康；在炮火硝烟中冲锋，军服必须具有一定的防火性能；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军服必须具有防弹的特殊功能；在江河湖海中

作战，军服要有一定的托浮和防水作用；在现代侦视器材的监控下行动，军服必须具有一定的防侦视的“隐身”能力；在核、化、生条件下战斗，军服必须具有防原子辐射、防化学沾染、防细菌侵害等用途。

军人的穿着打扮受社会历史、经济实力、地理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及战争样式、军事制度的影响，并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穿着军服的社会性目的和生物性目的也逐渐地占据重要位置，军服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可见，军服是社会风尚的表现形式之一，各种思想意识和习俗，都会在军服上有所反映。所以评价军服的水平，不仅看军服的质量和数量，更必须看军服防伤害功能、标志作用和文化内涵。

早在远古时代，随着军队的产生，为了适应更好地使用兵器、区分敌我和便于作战的需要，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军服雏形，也产生了相应的军服文化。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各民族间，在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就有明显不同。《淮南子·览冥训》就称：“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因此，在服装上所赋予美的内涵及所创造出来的美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具体从各个民族的军服来说，它的产生和演变，与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各民族间有着一定的影响。大到整套服装，小到服饰上的点点装璜，无不体现出各个民族对美的共同追求和对美的独特创造。中国传统的衣冠服饰之所以千姿百态，完全是各民族人民亲密合作和共同创造的结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秦风》,其中的《无衣》一诗就用军服来描写军队内部的团结友爱：“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难道说没有军服穿？可以和战友合用一件战袍……难道说没有军服穿？可以混穿战友的内衣……难道说没有军服穿？可以借用战友的裤裙……这是一首洋溢着团结战斗精神的慷慨激昂的军歌，表现了秦国士兵之间同甘共苦的友爱。后世称军人的友谊为“袍泽之谊”，即由此而来。可见，军服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从服装文化史的角度讲，中国是衣冠古国，也是“衣冠王国”。军服作为制式服装，反映了军事集团的文化素养、内在气质的形象外化，并以其形象外化又烘托出民族的性格特点及其文化背景。每一个时代的军服，有其不同的风貌。它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以及所受的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有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山川秀美、气候温和，是人类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无论是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还是其他各种文化时代，都对军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民族军队的服装，文化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民族文化就相互交流。内蒙长城地带的古匈奴族、蒙古族，大兴安岭的古鲜卑族，大西北的古羌族，白山黑水的满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云南的傣族、白族、纳西族，广西的壮族，贵州的苗族，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等，56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天赋的优厚物质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出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服装文化。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服装，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历史；中国

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文化；中国的服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文化味十分浓郁的服装。服装及饰物、冠冕及帽饰，造型和施色都是各民族在不断观察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并把它作为服装的制裁及其形、色、纹样的源泉，使服装在发展上按实际需求，又可达到审美的目的。此外，再加上保暖、宗教信仰、季节、时代、文化等因素，逐渐使服装的形、色、纹样有机地统一起来。

祖国的文化艺苑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从原始社会到现在，各种军服如奇葩异卉，斗妍争辉；各种服饰如涓涓清泉，汇为滔滔江河，蔚为壮观。中华各民族长期共处交往，各民族军队的军服文化互相吸收、影响，有如异花受粉，发展得更为鲜艳。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军事文化史中，军服文化以其优秀的民族传统占有极其光辉的篇章。它以其独有的魅力，丰富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内涵。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可以说，军服是一个时代的形象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研究宗教史、制度史、风俗史、美学史以及文化史等等。可见，在军事文化艺苑中，军服文化占有相当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古埃及的雕塑和墓室的壁画上，我们可以窥见古埃及法老大军的威严；从古希腊的雕塑和陶盘上，可以看见披甲戴盔的勇猛诸神和斗士。中世纪早期，在欧洲大地普遍的混战中，骑士和诸侯贵族各自带领为其效忠的侍从们参加战斗，在许多文化书籍中都有描述。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传令官穿着复杂的传令使服意味着代表国王。因而，当国王与英国人谈判时，便说：“看见我的衣服便知是我。”军服的文化含义和标志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7 世纪军士的穿着和装备区别出不同的军阶和兵种。两军对垒短兵相接时，毛瑟枪手带着特殊的子弹袋，骑兵则穿着骑兵服挥动军刀，杀向敌方。不同的军服和装备首先是区别了敌我，便于寻找作战目标。在当时戏剧般的战斗中，军服的鲜艳颜色使士兵们在遭到炮击或敌骑兵的猛烈攻击时仍能识别敌我，向自己人靠拢。其次是便于在作战中进行有序的分工。到了 18 世纪，欧洲大量的应征部队已经统一了军服。不但他们自身清楚，即使部队没有旗帜和标志也能辨认出来。欧洲和北美的军人几乎都穿着不同色彩的短上衣，头戴钢盔。尽管拿破仑将军在滑铁卢战役时仍穿着简单而没有标志的灰色大衣，但他的部队将士却旗帜鲜明，穿着标志清晰的军服，军官们佩戴着等级鲜明的肩章和臂章，就像所有的欧洲军队一样，可以从它们的军帽和衣服上辨别出属于何种部队，官居何职。

可见，军服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镜子。纵观 5000 年间的中国军服文化，尽管有万千变化，各具特色，但在形制、服制、服饰、纹饰、尚色等方面，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虽然现在很难找到过去遥远年代军服的完整实物，但通过军制史、战争史、服装史、文学史、考古学史、戏剧史、美术史等也能窥其大概。如从文学史著中、军旅诗词中就可以探寻到军服的文化蕴意；从戏剧服装史中也可以窥见各个朝代军服的基本风貌；从历史美术作品中同样可以真实地再现军服的历史风采。如“凌山炫组甲，带衣被戎船”，就出自南朝著名文学家王融《从武帝琅邪城讲武》一诗：山头上排排盔甲在闪耀，大江中条条战船在行驶，表现了南齐永明十一年，武帝萧赜率领身穿铁甲征衣的大军，分水陆两路征战的壮观场面，颂扬南齐的所谓军威，抒发扫

平北魏的愿望，同时也显露出华夷不共戴天的文化心理差异。这种文化心理差异，实际上是汉统意识在起作用，带有很大程度的自以为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华疆域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形成较大气候的民族，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别的民族，尽管文化心理有差别，但都属于中华文化心理。就拿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来说，从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五世，到与南齐对峙的孝文帝即位，不但武功灿烂，拓地广阔，文治亦经历代录用汉人贤能之士，华化甚深。又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纪念碑式地再现了秦代将士军服文化的神韵。

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说，军服是一种符号。因此，我们面对的古往今来繁杂多样的军服，是一册有待加以解读的文本。解读需要代码。在所有的服装中，军服的代码是最为明确和严格的。军服是军事集团的制服，具体表示军事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和团体的区别以及军事集团内部的组织状况和等级制度。由于军事活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军服是完全被制度化了的，也是最为符号化的。研究军服自然要研究军服的制度，即服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军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本，不只体现一种代码。因为铁甲征衣处于多重文化交织的关联区域中，它必然受到诸多代码系统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宗教的、习俗的、审美的，等等。因此，对中国军服的解读必须使其与中国文化的其他文本相参照。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隐蔽在军服文本深层的文化，才能发现在纷纭繁杂、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军事文化中军服文化的真谛。

军服的历史流行趋势类似水流，它的流速和流向与文化相互作用、沟通和交流，其流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时而

像潺潺溪水，时而又似奔流的大河，遇到陡峭的山势可直泻千里，碰上起伏的丘陵又被迫分成若干支流、湖泊。急速与迟缓，非水流自定，受天候、地理等外在环境的制约。不过，中国军服文化流行趋势作为一个个体毕竟同世界军服文化的大潮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向。中国军服文化的大潮大多奔腾朝着一个方向，当然它也有往复、回潮，但即使分成若干支流，最终又会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向大海奔流而去。这与中国历朝历代时分时合、分久必合的历史文化相吻合。世界军服文化则不然，它一旦分成多股支流，这些支流就不一定再汇合，相反会各自形成“大河”或“湖泊”，形成各个国家军队的军服文化。这股洪流折射出军服这一独特制服文化经久不衰的魅力。

军服文化在流行中往往表现出渐变、突变、跳跃、反弹等特点。渐变是军服文化流行中最自然又最普通的一种流速了。它是由形制的部分改良和美化而形成的，一般出现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人们往往在较为平和的气氛下接受新事物、新模式，又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所以，选择和吸收、模仿的过程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进行的，因此出现了一种表现在军服流行上的循序渐进的态势。

突变表现在军服的流行上，主要是因为战争、社会大的变革等，从而导致某种军服样式突然涌入某国、某地，以铺天盖地之势弥漫了这一个区域。当然，民族文化传统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也许随着军队的退却，这种样式的军服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充其量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突变在历史上，在军服文化的演变史上，却实实在在地打了一个惊叹号，而且会在流行高潮以后，以残存痕迹遗留下来，作为以

后军服的某一个结构组成部分而永远记下那快速的一瞬。

军服文化流行过程中的跳跃属于突变，其性质与表现也与事物突变过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军服文化流行中快速的、大幅度的跳跃并不常见，不会频频出现。一般都是随着生产力和战争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长期停滞不前，必然会引起突变，所产生的军服形制确实距原来传统服装的风格相去甚远，从而产生跳跃。这主要发生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各国军队缺乏横向交往的古代社会，而且仅是其中的一种原因；再一个往往是渐变而形成的积累，长期停滞和长期酝酿都可能产生一个大的跳跃。如政权的更迭、朝代的变换，都会使得军服出现新的形制，但往往不会持续跳跃。跳跃之后必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趋缓阶段。趋缓是渐变性的积累，长期趋缓以后必然会有新跳跃，再趋缓，再跳跃，这几乎成了军服文化发展中亘古不变的规律。

变异之后的反弹，也是军服文化的重要特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古代军服，有一部分后来成为流行的时装。如清朝的罩甲，最初属于戎衣，后来从宫廷到民间，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喜欢穿着；古代文人雅士的斗篷，演变成 20 世纪初军人的披风，百年以后又披在了妙龄女子的身上，成为了时尚。看来是复古，实则是创新，“推陈出新”可以构成时装，“用陈出新”同样可以构成新潮时装。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马纽·安格罗曾说过：“每个地方的服装风格，都和民族文化等有很大关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服装对世界有很大影响，包括对我的影响。”少数军服为前后几个朝代连续采用，流行时间长达 1000 多年。有时在渐变，有时在突变，有时在趋缓，有时

又在反弹，这正是军服文化永不休止的运动状态，而在运动中的每一变异，都形成了新的军服形制。

本世纪的前四五十年间，世界上经历了两场轰轰烈烈的世界大战，同时也演绎了一台不同国度的军服文化。由于科技的进步，现代武器的应运而生，军服在结构、材质以及服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程度的进步。发达国家在军服材质上占绝对优势，从而导致了一种世界性的军服文化。而服制以及服装上的服饰佩件的特殊含义，构成了军服这一特定的制服文化固有的特征。就世界范围来讲，军服文化还浸透到世界各国民用服装文化中，其中影响最大的美式军服、英式军服、德式军服和苏式军服。尤其是前苏联的军服文化和风格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流传甚广，对中国的现代服装和军服设计产生相当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陆军的黄褐色、海军的蓝色和舰队的绿色军装逐渐演变为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用茄克往往被人们从战场带回家作为休闲服穿用，诸如艾森豪威尔式或称战斗式茄克、狸皮或毛葛裤以及狙击手皮茄克等等。美国一家生产飞行茄克的公司在转向生产民用茄克衫后，每年大量推出可配穿牛仔服的多姿多彩的茄克衫，成为对青年人极具吸引力的“劲”装。还有各种运动茄克，频频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滑雪场、赛车场和登山运动中。

当时装更多地占有时尚舞台时，设计师灵动的双眸也纷纷投向了曾经在硝烟弥漫中驰骋的军服。直到今天，在现代服装系列中，无论是礼服、运动服、休闲服、猎装，还是各类职业服，常常可见军服的影子。如时髦的暗绿色，猎装式四个盖兜的款式，贴身合体的造型：合肩、贴胸、收腰、裹臀，简单的腰带，金属扣子，肩部的装饰……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世界局势的动荡，使得人们对“将军服”用于便装的兴趣再次复苏。 80 年代，有的设计师把野战部队的迷彩服重新注释了内涵，搬上了时装展示的 T 型台，使战地迷彩服以其狂野的姿态攻占了流行这一战场；有的女装军服化，显得很有气势；有的把印有反战标志的裙子和拿破仑的大帽子搬上了时装舞台。如果说战争的危机意识依然强烈地影响着流行，那么军服便是一种寻求自我保护或对外扩张的最直接的风格体现。陆、海、空的钉扣式大衣民用化和茄克、衬衫等的军服化，更是锐不可当。正因为军服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民众的作用，古往今来，一些帝王和领袖人物比较注意自己的服饰形象，把自己的服饰当作一种无声的语言，来向民众倡导自己的主张和表示自己的决心。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就以常年穿军装来号召人民抵制外来的干涉和侵略。又如列宁装、中山装曾经风靡一个时代，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军服文化与时装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事实确实如此，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以阿拉伯传统服装款式为主题的新式设计在时装市场上流行了好一阵子。1995 年春，在德国杜塞尔道夫 IGEDO 国际服装博览会上，展示的以“捕鱼人和他的妻子”主题的时装，其大衣就受军服文化的影响，采用的样式是高领、双排扣、配肩章形饰物。1998 年中国的抗洪抢险斗争中，代表人民军队的迷彩服风靡整个神州大地。

巴黎的时装设计至今已有 800 年的历史，是法国文化最宝贵的传统之一，直居于世界时装潮流的领导地位，影响全球的流行穿着。从风靡世界的巴黎时装中，也可以看到军服文化的踪影。如 1997 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克劳德·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塔纳设计的双排扣短风衣，就是从军服变化而来的款式，体现着潇洒而古典的阳刚之美。法国“ HERMES”（爱马仕）名牌时装中独具特色的“仿马鞍针缝”，则是古代马铠生产工艺的升华……

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
——漫话服制

我国古代秩品和服制，有一套独特的等级区分。“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是曾任北周骠骑大将军的庾信《拟咏怀》诗中的句。“都护”、“将军”均是指汉代的武职官吏。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国家之后，官吏就随之而出现了。我国古代官职的名称，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诞生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初就已出现，而用以规范官吏等级的“官秩”到了周代才有记载。作为武职官员则用“武阶”来表示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元帅”、“将军”、“校尉”等武职官员。这些名称同当今军衔的作用一样，都是用以表明官员身份的高低。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冠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当阶级和私有制出现后，服装除了有防护和美观的作用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特殊用途，成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即用来显示不同阶层人们的不同身份。尊卑贵贱，各有分别，服制也就应运而生了，具体以冠服佩饰在外观形象上作区分标志。据中国关于“服制”和“服饰”的

史料记载：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服制的国家。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虽历代有所修改，但以不同服制体现等级差别的基本制度，却长期沿袭不变。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传统的军戎服制均是传统意识下的产物，必然带有当时社会文化色彩，尤其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服制，带着保守的含蓄美和带宗教色彩的装饰美。军服的式样通常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每个新的政权建立后，都会对其军服形制作出规范。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式样，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的。

中国的服制，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自夏商朝起，中国开始出现服制，到西周时已基本完善。从此，帝王将帅、达官贵人、校尉兵卒的衣冠服饰均有严格的区别。在古装戏曲和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古代武将的冠服、佩饰具有不同的式样、颜色和图案。冠服表面上的颜色和图案的差异和佩饰标志，反映了古代官吏品阶、地位尊卑、权力大小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武阶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封建人身等级制度在官制中的表现形式。

在殷商时期，社会的生产力普遍又进一步提高，甲骨文中出现桑、蚕、帛等字，可见当时农业的发展已到成熟时期，在商代安阳墓中出土的铜钺上存在有雷纹的绢痕及丝织物的残片等，如此高度精铸的青铜工艺品的制作，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的生产力的发达情形。物质生产丰富、剩余，就有攫取这种劳动品的上层人物出现，就有阶级的分化、被剥削的奴隶的出现。商代即是进入奴隶社会的时期。在甲骨文中有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字词，也就说明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商书》云“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 ”，即表示有至高的权力。既然有奴隶主及其臣、牧，当

然就有奴等一类被统治的奴隶。这种等级差别，也必然反映到服装上来。不过商代在服装上究竟怎样区分尊卑等级差别的，史载不甚详确。在出土文物中，多限于作为当时服装的佩饰，如玉佩、铜饰等，既有较完整的形象，也有装饰性变形的人像，从中只能窥见服饰中的某一构件的形象，如芾、帽、带等，还不能从中看出其等级制度的差别。虽然如此，但那些精美的饰件，足以体现当时奴隶主的奢华，间接地可以说明在那时他们的服饰一定十分考究精美。

周代时期，贵族官僚的服装等级区分严明，进一步在服饰上制度化。由于周代分封制的确立，阶级间的等级制形成，后期又萌发了封建社会制度，这就使服装等级差异上的区分较为系统化。其中比较显著的，如冕服制中的六冕和弁服中的三弁。举凡一切制度，包括服制在内，总是有由简单而再逐渐进入完整的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统治者逐步制定出一些规章，以确保其社会秩序的安定。由于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适应于当时的各种礼仪也随着产生。《周礼·春官》云：“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专门设了“司服”一职，掌管服制的实施。根据“事”的不同，服饰就是为此并从属于这种需要的，如祭天地、宗庙等就有祭祀之服；朝会之间就有朝会之服；兵事就有从戎之服等。上自古代天子，下至庶民，等级有高低，在处理各项礼仪等活动上，都有应着的服饰。孔子说“服周之冕”，说明周之礼服已具规模。

《周礼·春官》云：“祀昊天上帝、五帝，服大裘，其冕无旒，玄衣纁裳，朱裨。享先王，服衮冕，十二旒，衣裳自龙以下九章。享先公、飨射，服鷩冕，九旒，衣裳自华虫以下七章。祀四望山川则，服毳冕，七旒，衣裳自宗彝以下五

章。祭社稷五祀，服则絺冕，五旒，衣裳自粉米以下三章祭群小祀，服玄冕，三旒，衣裳只黼纹一章。”就是依礼的大小轻重而各服其服。所以说至周而服饰之制备矣。关于《周礼》一书，说者不一，其中不少采集了周代的史料。如冕服在周代，可说是已有较为详备的制度了，但如天子五冕的使用和公、卿、大夫五冕的使用，虽甚为详尽，在具体使用上则往往有相类似及混杂之处。如天子服玄冕祀群小，群臣陪祀也服玄冕，则与王者相似，虽有旒玉上的十二玉和九、七、五玉等区别。按礼群臣必降天子等之服，如此天子服元冕则群臣无冕可用，降而求其次则为服爵弁服，爵弁服是在六冕之外的一种冠服，所以到后世天子惟用衮服，自鷩冕服以下，天子不再服用，这样变化是既尊崇天子又不贬低众臣。所以宋儒朱熹说《周礼》是一个草本，在周代也不完全按此使用。也有人说，犹如唐代的显庆礼、开元礼，虽然制定，而在当时也未必按照使用。至于说是后世附会的说法，恐也未必如五等冕之类型，可说在周时必有此制度；又如服大裘之冕，在冬则可行，在夏则不能通用，在此有不合时宜的情形，因而后世天子有惟服衮冕为尚，也有冬用大裘冕而夏用黑缯代之者。

到了周代后期春秋战国之交，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在这前后的整个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加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诸侯国之间兼并和争夺连绵不断。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文人学者，相互探讨，相互诘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问题，有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及礼仪法度等等，对衣冠服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维护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主张一切言行包括衣

着装束都必须“约之以礼”墨家则提倡“节用”，主张衣冠服制及其他生活器具只求“尚用”，不必过分豪华，更不必拘泥于繁缛的等级制度，“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反映了墨家学派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态度。继孔、墨之后，又出现了荀卿，他从封建制度的要求出发，提倡“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这种哲学及美学领域里的思想斗争，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仍未止息。但由于儒家思想同历代封建王朝维护皇权统治、惟我独尊的思想相吻合，冠服制度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尤其是汉代以后，帝王公卿百官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等级制度也日益严格。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皇朝统一中国后，在许多“异”上大体都化为“同”了秦始皇“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春秋之前中国没有专职的武官，军队由天子和诸侯统领。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兵种增多，战略战术日趋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

秦代首创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巩固一统的新生政权，东征西讨大量用兵，任用了许多将帅，使武官制度有了一个雏形。秦代的军戎服饰是至今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详细的朝代，这要归功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这些兵马俑的服饰、鞍辔配件等各个细节都雕塑得很逼真、准确，从而为研究秦代的服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实用价值将帅的服饰与士兵的服饰已经出现一些不同。

“汉承秦后，多因其旧”，汉代大体上保存了秦代的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